

## 俞國華先生在央行行誼\*

彭淮南\*\*

前總統府資政、行政院院長、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先生，由於獲得兩代蔣總統的信任和倚仗，身負國家經濟、金融、財政重任，前後幾十年；為國家人民做出巨大貢獻，是大家耳熟能詳、衷心欽佩的事。淮南願意藉此機會，只就俞先生在央行的事蹟貢獻，摘要報告。

俞先生先是在民國 58 年 5 月間，以財政部長身分兼任中央銀行總裁；在第二年的 6 月，卸下部長職務，專任央行總裁。到 73 年 6 月出任行政院長，擔任央行總裁前後整整 15 年。

雖然民國 50 年 7 月，央行就已經在台復業；但正是在俞先生任職期間，我國的央行才朝向現代化的中央銀行邁進，成為真正的中央銀行，也開啟了我國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和制度化的進程。

在俞先生任職央行的第 1 個 5 年（58—63 年）中，正值我國邁入經濟起飛的年代。因應政府追求快速成長、維持物價穩定的發展策略，央行在 60 年 2 月成立了「中長期信用特別基金」，支援「十項建設」等基礎建設所需資金；另建立外銷貸款轉融通制度，並



俞前總裁國華先生遺像

運用外匯存底開辦進口機器轉融通，協助企業提升競爭力，拓展外銷。央行也開始著手建立金融制度，以提高金融效率；包括在 61 年建立貼放制度，62 年首次發行乙種國庫券及儲蓄券。其後，又與財政部聯合推動銀行發行承兌匯票、可轉讓定期存單等，俾作為日後央行調節金融的標的，並為成立貨幣市場預做準備。

在 64 到 68 年的第 2 個 5 年任期中，最

\*\*\*\*\*

\* 本文係 96 年 6 月 16 日於俞國華文教基金會舉辦「台灣金融與經濟發展關係研討會」中之講詞。

\*\* 中央銀行總裁。

重大的政策是在 67 年將固定匯率制度改為機動匯率制度，繼而在 68 年初成立外匯市場，由市場供需決定新台幣匯率。由於外貿出超逐漸擴大，外匯收入增加，央行逐步放寬外匯管制，使進出口商可以外匯存款的方式持有外匯。另外，建立單一存款準備制度，以利貨幣政策執行；且在 65 年協助建置貨幣市場，央行可以透過買賣票券調節金融；企業也可以在貨幣市場籌措資金，有利經濟活動運轉。於是，央行在 68 年初首度實施公開市場操作；目前公開市場操作已是央行日常調節市場資金最重要的政策工具。

在 69 到 73 年的第 3 個 5 年任期中，最具政策意義和價值的是開啟了利率自由化的進程。69 年新訂「銀行利率調整要點」，銀行可以參酌貨幣市場利率，自訂可轉讓定期存單利率，銀行存放款利率自由化從此展開。同年，同業拆款市場成立，使銀行間短期資金調度便捷，和貨幣市場共同形成完備的短期資金市場。72 年底，准許銀行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從事境外金融業務，以加速推動金融國際化，提升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

談到這裡，我想引述俞先生在 73 年 4 月間，為清華校友通訊所寫的「央行時期的生活簡述」裡的一段文字，作為補充和印證。俞先生是這樣說的：「在過去十年中，我仍一直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同時兼任中央銀行總裁的職務。從 61 年起，我又擔任了行政

院財經小組的召集人。財經小組是由央行總裁、財政、經濟兩部長，行政院秘書長和主計長五人所組成，負責有關經濟財政和金融政策的策劃審核和協調，這更加重了我的工作。自己常感才輕學淺，難勝負荷；所以無時不鞭策自己，戮力以赴，期能對國家和人民有所獻替。66 年 12 月，政府為了加強經濟建設，又將財經小組與經濟設計委員會合併成立經濟建設委員會，規模愈大，任務更艱。當時即以兼職過多，難勝艱鉅，請辭新職；但未能獲得院長蔣公的允許，祇得服從命令，兼任經濟建設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經濟繁榮時，尚易肆應；但到了經濟不景氣時，除任勞外，更須任謗任怨，方能度過驚濤駭浪，來完成任務。」

俞先生接著在文章中詳述當年我國在經濟和政治上所經歷的種種困難和挫折。他說：「在這期間，是我國經濟轉型階段，遭受石油危機嚴重打擊的時期，同時我國又一再遭受國際政治無情的挫折，真是困難重重，阻撓橫生。先是 1973 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在一年內高漲了 4 倍以上，頓時使非產油國發生嚴重的國際收支問題，同時也引起了巨幅的通貨膨脹。1972 年我國物價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第二年更上漲了百分之四十；高度通貨膨脹的來臨，真使全國有如臨大敵的感覺。政府為應付石油危機及安定物價，乃在 1974 年初大力實施『穩定當前經濟方案』，巨幅調整油電價格、交

通費率和提高利率等，以期安定經濟。最幸運的，這一措施能立即見效，使物價不久即趨穩定。不料接著而來的，是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我還記得在 1974 年年關時，多數工廠都感週轉不靈，甚至無法發薪。很多工廠就以它自己的產品，如成衣等發給工人來代替工資。所以當時沿街都是攤販，在出賣產品換取現金。幸而第二年我國經濟日漸復甦，而且高度成長，故被經濟學家譽為處置第一次石油危機最成功的例子。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 1979 年 12 月，美國突然宣布與中共建交，同時即與我國斷交。美國一向為支助我國的一友邦，而與我國經濟最為密切；一旦斷交，其對我打擊之大，不難想像。不過自美總統尼克森 1972 年訪共以來，我國人早已料到有此一日，所以在心理上已有準備；不久美國亦通過了台灣關係法，來維持中美間的實質關係，所以對我經濟的衝擊，反不如我國退出聯合國時之劇烈。第二年— 1980 年春天，我國又被迫退出世界復興開發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對世銀來說，我自退出聯合國後，世銀即對我停止貸款，故實質上影響不大；但在基金方面，我國卻喪失了一個在國際收支失衡時，可以融通資金的機構，同時使我國在國際金融方面，更形孤立。而在同一年內，繼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即發生世界經濟不景氣。第二次石油危機雖不如第一次嚴重，但是 1980 年的經濟不景氣，卻遠超過 1974 年，而且時間

竟長達三年之久。好在我國經濟基礎較好，即使在不景氣期間，我國經濟仍有較低的成長，出口貿易繼續增加。到了 1983 年第二季，隨美國經濟復甦之後，我國即逐漸開始復甦；不但較歐亞其他國家為早，而其成就亦較其他國家為佳。在這多難期間，一再遭受國際政治和經濟的挫折，但仍能提前復甦，快速成長，這不能不歸功於我政府政策的成功，和人民艱苦奮鬥的表現。」

以上引用俞先生的文章，不但是在座所有貴賓、朋友們的共同回憶，也足以彰顯俞先生對國家的貢獻。

73 年 6 月，俞先生卸下 15 年央行總裁的重任，出任任務更為艱鉅的行政院院長，到 78 年 5 月辭去院長職務，正好又是一個 5 年任期。這一個 5 年任期，好像和央行沒有直接關連；但事實上，如果沒有俞院長的支持，央行的一些重大政策，勢必難以制定並付之施行。這一段期間，我國對外貿易順差加速擴大，國內資金大幅增加；為因應此一情勢，央行放寬銀行自行訂定基本放款利率、存款利率，促使利率完全自由化。並推動外匯自由化，包括：75 年間進出口貿易外匯管理由許可制改為申報制；76 年間大幅放寬外匯管制，凡商品、勞務貿易，及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的資本交易所需外匯，均可自由結匯；大幅提高公司及個人每年自由結購外匯額度，使民間得自由持有及運用外匯；78 年間廢止新台幣兌美元中心匯率制度，除

小額結匯外，匯率完全由銀行自行與顧客訂定等措施，奠下促進外匯市場健全發展及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基礎。

從 58 年俞先生擔任央行總裁到 78 年卸任行政院長的 20 年間，也正是我國經濟由穩健成長以至繁榮起飛的階段。因此，身負國家經濟金融財政重責大任的俞先生，對國家的貢獻，實在是不言可喻，無須費辭！

「大其心，容天下物；平其心，論天下事；虛其心，受天下善；潛其心，觀天下理；定其心，應天下變。」這是俞先生的座右銘。他生活簡單而有規律，作風平實而穩健；為人處事，可以「忠勤謀國，無私無

我」八個字來概括。這不但是央行全體同仁的深刻體會，相信也是今天在座各位貴賓、朋友的共同感受。

俞先生是在 89 年 10 月 4 日離開我們的。以他平日身體康健、精神矍鑠的狀況，忽然逝世，大家都難以接受，也都認為跟夫人早他不到半年過世有關，足見他們鸞鶼情深。今天我們在這裡紀念俞先生，我想大家都會深深體會「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的意義，而對俞先生更加崇敬、懷念不已！

很榮幸有此機會就俞先生在央行的行誼，做以上簡單的報告。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